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

□ 臧运祜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

□ 臧运祜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臧运祜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12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ISBN 7-80149-441-5

I. 七… II. 臧… III. 对华政策-研究-日本-1931~1937 IV. 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6238 号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



著 者: 臧运祜

责任编辑: 杨 群

责任校对: 张景秋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春雷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2.75

字 数: 306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441-5/K·045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学术评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戴 逸
副主任委员 齐世荣 金冲及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思治 刘桂生 刘家和 阮芳纪 (常务)
陈铁健 张振鹍 张椿年 经君健
郭松义 谢曙光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沈志华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一川 于 沛 牛 军 王小甫
李 凭 李世安 李丹慧 杨 群
陈东林 范广伟 黄燕生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书目

1994 年度

- 《魏忠贤专权研究》，苗棣著
-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高王凌著
-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朱德新著
-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王中田著
- 《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沈志华著
-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李世安著

1995 年度

- 《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吴霓著
- 《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郭润涛著
- 《1895~1936 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陈争平著
- 《1949~1952 年中国经济分析》，董志凯主编
- 《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马龙闪著
- 《利玛窦与中国》，林金水著
- 《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974~1911 年）》，吕昭义著

1996 年度

- 《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许檀著
- 《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吴吉远著
- 《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罗检秋著
- 《南通现代化：1895~1938》，常宗虎著

《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左玉河著

1997 年度

《〈尚书〉周初八诰研究》，杜勇著

《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
侯旭东著

《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陈爽著

《西域和卓家族研究》，刘正寅 魏良弢著

《清代赋税政策研究（1644～1840 年）》，何 平著

《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中俄西北边界大臣的察哈台、满、
汉五件文书研究》，何星亮著

《中东和谈史（1913～1995 年）》，徐向群 宫少朋主编

1998 年度

《古典书学浅探》，郑晓华著

《井中奇书考——郑思肖〈心史〉暨宋季明季爱国诗文研
究》，陈福康著

《辽金农业地理》，韩茂莉著

《元代书院研究》，徐勇著

《明清高利贷资本》，刘秋根著

《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尚小明著

《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李细珠著

1999 年度

《唐代翰林学士》，毛 蕾著

《唐宋茶业经济》，孙洪升著

《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臧运祜著

《改良的命运——俄国地方自治改革史》，邵丽英著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改版弁言

从1998年起，文库改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设立文库的初衷，“出版前言”都讲了，这是历史记录，改版后仍保留，这也表明改版并不改变初衷，而且还要不断改进，把工作做得更好。

1994年，面对学术著作出书难，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毅然支持，文库得以顺利面世，迄1997年，已出版专著25部。1998年，当资助文库的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面临调息困难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又慨然接过接力棒，并于当年又出了改版后专著7部。5年草创，文库在史学园地立了起来，应征书稿逐年增多，质量总体在提高，读者面日益扩大，听到了肯定的声音。这些得来不易，是要诚挚感谢大家的；而需要格外关注的是，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不足和遗憾，必须认真不断加以改进。

如何改进？把这几年想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全力以赴出精品。

文库创立伊始就定下，资助出版的专著，无例外要有专家推荐、经编委初审、评委终审并无记名投票通过，从制度上保证选优原则；评委们对专家推荐的书稿，是既充分尊重又认真评选，主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前后两家出版社也都希望出的是

一套好书。这些表明，从主观上大家都要求出精品。从客观来说，有限的资助只能用在刀刃上；而读者对文库的要求更是不断在提高，这些也要求非出精品不可。总之，只有出精品才能永葆文库的活力。

出精品，作者提供好书稿是基础。如“出版前言”所指出的，开辟研究的新领域、采用科学的研究新方法、提出新的学术见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达到或基本达到这些条件的，都是好书。当然，取法乎上，希望“上不封顶”；自然，也要合格有“底”，初步设想相当于经过进一步研究、修改的优秀博士论文的水平，是合格的“底”。有了合格的好书稿，还需推荐专家和评委的慧眼，推荐和评审都要出以推进学术的公心，以公平竞争为准则。最后，还要精心做好编辑、校对、设计、印装等每一道工序，不然也会功亏一篑。

五周岁，在文库成长路上，还只是起步阶段，前面的路还长，需要的是有足够耐力的远行者。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1998年9月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出版前言

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思想观念随之逐步改变，全国热气腾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举国公认，世界瞩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尚待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在社会各个角落弥漫着“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的浊流。出版界也难遗世而独立，不受影响，突出表现为迎合市民心理的读物汗牛充栋，而高品位的学术著作，由于印数少，赔本多，则寥若晨星。尚无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求出书而无门，感受尤深。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已使莘莘学子扼腕叹息。

历史科学的责任，是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现实。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者，与此关系匪浅。中国是东方大国，探索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能更加直接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借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历史学科十分关心，但限于财力尚未充裕，资助项目难于面面俱到。我们是一群有志于东方史研究的中青年学人，有鉴于此，几年前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机构，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创业伊始，主要是切磋研究。但感到自己研究能力毕竟有限，于是决定利用自筹资金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有关东方历史的优秀研究

成果出版。凡入选的著作，均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作为丛书的总名。

我们这一举措，得到了老一辈史学家的鼓励，中青年同行的关注。胡绳同志为基金题词，在京的多位著名史学专家慨然应邀组成学术评审委员会，复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允承出版；全国不少中青年学者纷纷应征，投赐稿件。来稿不乏佳作——或是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或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同类著作；或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百花齐放，绚丽多彩。这些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也增强了我们办好此事的信心。

资助出版每年评选一次。凡提出申请的著作，首先需专家书面推荐，再经编辑委员会初审筛选，最后由学术评审委员会评审论证，投票通过。但由于基金为数有限，目前每年仅能资助若干种著作的出版，致使有些佳著不能入选，这是一大遗憾，也是我们歉疚的。

大厦之成，非一木能擎。史学的繁荣，出版的困难，远非我们这点绵薄之力能解决其万一。我们此举，意在抛砖引玉，期望得到海内外企业界，或给予我们财务支持，使我们得以扩大资助的数量；或另创学术著作基金，为共同繁荣历史学而努力。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1994年9月

序 一

臧运祜博士的著作《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获中国史学会东方基金资助，就要出版。作者恳切地邀我作序。这是因为1998年6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的臧运祜博士论文答辩会议上，这篇论文获得了答辩委员会的好评。现在经过作者进一步修订，避免了原文中若干缺陷，使原作更臻完善。我认为，这确实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学术著作。

在那次答辩活动中，我撰写过学位论文评阅书，并且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我认为，这是一篇相当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九一八至七七事变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论文。应该说，这个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是中国学术界比较缺少研究的方面。作者在论文中回顾了中日两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在已有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对这个时期的日本侵华政策按照其形成过程，分阶段进行了整理，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在其大陆政策的基本框架指导下，从设计、提出、讨论、冲突、协调到最后决策的过程；揭示了这一政策由军部为主动，外务省从策略的角度加以配合，最后由政府名义提出的制定特色；揭示了日本军政方面为分阶段提出不同的侵华政策，在其内部发生的种种矛盾、冲突和斗争所引起的政坛震荡，说明了日本政府结束政党政治，迅速法西斯主义化和军国主义化的过程；也揭示了国际绥靖政策，特别是中国国内的不团结和分裂、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地方反蒋派的反蒋和抗日活动的矛盾交织、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日本侵略的

妥协退让及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给了日本分阶段制定其不同时期的侵华政策以外部的可能机遇。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论文很好地重建、复原了日本侵华政策的本来面貌。作者的这种研究，对人们深入认识这个时期日本对华政策做出了贡献。作者在研究中系统地参考了文献档案，尤其是日本的文献档案，注意了并且有分析地引用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而，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可靠的文献资料基础上，其研究结论是有资料根据的，是经得起推敲的，也是可信的。

作者写作态度严谨，对历史过程的描述不避繁细，着力于重建历史过程，这是优点，而且是很必要的。重建历史过程，是历史学者的基本功。离开了这个基本功，夸夸其谈，历史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不能存之久远，是可以预卜的。当然，如果有重建历史过程的基础上，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做出必要的分析和解说，从这种分析和解说中看出事物发展的关联性，或者说规律性，这必然给读者带来某种启发、启示，我想人们说读史使人明智，兴许就是指此而言。如何做到这一点，或许言人人殊，但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确是每个企图在自己的著作中重建历史过程的人必须努力以赴的。我愿以此与臧运祜博士共勉。

这本著作的问世，我相信会受到我国抗战史学者的关注。

张海鹏

1999年12月17日

序 二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说的是打仗时，必须充分了解己方与敌方的情况，才能战无不胜。其实，这句话也完全适用于历史研究。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充满了敌对国家、敌对派别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类型的斗争，历史学家们必须充分研究敌对两方的资料，综合分析，才能洞悉彼此，胸存全局，写出高水平的历史著作。多年来，我常常痛感，我们的历史研究往往偏于一方，而略于另一方。例如，研究中日战争史，只研究中方，而不肯下力气研究日方，所据所述，大体以中方档案或文献为主；研究国共关系史，只研究中共一方，而不肯下力气研究国民党一方，所据所述，大体以中共档案或文献为主。这样做的结果，写对方，常如雾中视物，模模糊糊，难得其清；写己方，常如身在庐山，囿于所见，难免其偏。

运祜先在北京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来又 to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他懂日文，在选择研究方向的时候，我向他建议，能否充分利用日文档案，研究“九一八”至卢沟桥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这一段，过去虽有若干著述问世，但相对说来比较薄弱，倘能认真开掘，不仅可以垦拓荒园，填补空白，而且也可能会有许多新的发现。运祜同意我的意见，接受了这一选题，认认真真地做起来，而且认认真真的完成了。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后，其下一个侵华的重点目标就是我国的华北地区。自1931年至1937年卢

沟桥事变爆发，六年中，日本政府和军部如走马灯似地经过了多次变动，其对华政策也有种种变化和不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侵略中国，特别是侵略华北的总方针始终未变。运祜的这本书，以日本的“华北谋略”和“华北工作”为中心，详细考察了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决策机制、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实施状况。我不敢说它对研究日本史有多大贡献，但是，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包括中日关系史、日本侵华史、抗日战争史）的学者来说，它可以帮助我们比较深入地“知彼”，因而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近代中国的特点是中国卷入世界，列强介入中国事务。30年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许多演出，其实背后都有列强牵线。其中，日本介入中国事务最深，因而，和中国政局的关系也就远较其他国家密切。这一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既以南京国民政府为对手，或战或和，影响中央政局，同时，又广泛支持地方实力派的反蒋活动，左右中国形势。这些方面，有许多内情和内幕活动，中文文献中没有记载，有关的中国当事人也不曾留下回忆，但是，运祜的这本书谈到了。因此，我觉得，这本书对于中国近代史学者“知己”，推进我们对有关历史和人物的认识，显然也有好处。

运祜的这本书，以日本外务省档案和日本军方保存的陆海军文书为主要资料依据。二者都是北京图书馆购藏的缩微胶卷，数量极为庞大。入藏以来，利用者一直并不很多。运祜能经年累月地坐下来，一卷一卷地读，一个文件、一个文件地分析，一个字、一句话地逐个研究、推敲，其间的辛苦是可以想见的。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用大力气，下大功夫，充分收集并研究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如何能在历史科学的海洋里有所前进呢！

运祜的书即将出版，我于欣慰之余，写了上面的感想，算是作为序言。

杨天石

2000年5月6日写于北京东厂胡同

前 言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九一八至七七事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主要以日本的华北政策为中心进行研究。兹首先就有关本课题的若干术语、中日两国史学界的研究状况以及本书研究设想,作一说明。

—

①关于“从九一八到七七”。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学术界以日本侵华史为主的著述就不断出现。但这些著述或囿于“厚古薄今”的史学传统,对于九一八以后日本侵华史的论述,大都简略^①。

① 陈觉编著《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就是一部记述九一八后日本侵华史的论著,可惜该书只写到1932年(该书之校订本,1991年9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并改名为《“九·一八”后国难痛史》)。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共7卷(天津大公报社印行,1932年),原拟编至九一八事变,但第七卷仅达于1919年巴黎和会(王芸生后于1958年起修订此书,续补第八卷自1920年至1931年,三联书店,1982年)。吴兆名著《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34年),是一部较为全面系统论述日本侵华史的著述,但对于九一八后的论述偏少。邹鲁著《日本对华经济侵略史》(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广州,1935年)一书,对于九一八后的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论述,甚为简略。周开庆编著《一九三六年中日关系》(正中书局,南京,1937年),略述了九一八后的日本侵华史,并主要论述了1936年间的中日关系;此书为七七以前论述九一八以后中日关系史的主要著作。

七七事变之后，又出现了总结抗战前6年即从九一八到七七的著述。李天民著《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成都，新新印刷所，1937年11月）一书，简要记述了从九一八到七七的6年日本欠下的血债。30年代后期，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纂过《抗战的中国丛刊》5种，收录了从抗战前到抗战三周年为止的资料，并于1940年出版。该丛刊之第一种为《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九一八以来的中国》则作为对该书第一编内容的补充^①。抗战胜利后，解放区又编辑出版过几种“从九一八到七七”的小册子，主要用来揭露日寇侵华和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历史。例如解放日报社编辑、1946年7月民众书店出版的《从“九一八”到“七七”》、晋绥日报社1946年8月编印的《从“九一八”到“七七”》。上述两本小册子出版后，曾分别由华东、冀东、渤海、辽东、牡丹江等解放区书店翻印。由于以上历史原因，“从九一八到七七”作为一个专门的历史术语，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史学科上固定并沿用下来。本书主要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的日本侵华史，并侧重于以华北为中心的日本对华政策。虽以“九一八”和“七七”两事变为前后标志，但在历史内容上则有所延伸，大致是1931~1937年间的日本侵华史。

②关于日本对华政策。“政策”一词，英语中的policy及日语、汉语中的含义大致相同。日本对华政策，就是指日本统治集团对于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策略、方针、措施与手段等。而在不平等的近代中日关系下产生的日本对华政策，则是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其对外政策的核心，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侵略扩张的指导方针与行动依据，故不少中国学者在论著中直称

①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抗战的中国丛刊》时，将《九一八以来的中国》作为“丛刊之六”，并改名为《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

为“日本侵华政策”。

从九一八到七七的日本对华政策，当时日方或称“政策”或“政略”，或称“方针”或“方策”，或称“施策”或“实行策”，或称“谋略”或“工作”，其名称多有变化。而根据国际关系和日中关系的状况，日本对华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也有不同的内容。因此，当时的“日本对华政策”，由于其历史内涵处于动态的演变过程中，很难确切地表述。七七之后，日本外务省曾在一份宣传材料中称：日本“对华政策的根本基调在于以下两点：1. 依靠日、满、华三国的提携共助，确保东亚和平；2. 以整个中国为对象扩张我国商权”。“对华三原则”（即“广田三原则”）就是上述基调的具体表现。这一政策又可区分为对“南京政府的施策”、“对华北政权的施策”、“对其他地方政权的施策”三个部分^①。这是日本官方关于当时对华政策的表述。鉴于上述状况，本文以考察日本对华政策的历史演变为基础，并选择了华北政策作为“切入点”集中剖析，以展示其对华政策的全貌。应当说明的是，九一八后日本对于伪满洲国的政策，理应属于同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范围，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多，本文只选择了九一八事变期间与华北政策相关的部分加以论述，其后则未予展开。

③关于“华北”。“华北问题”是“满蒙问题”之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日关系的焦点所在。但在当时，日中两国在政策上对于“华北”的界定有很大不同。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后，又侵占了热河省和东部内蒙古地区，并以上述所有地区作为伪满洲国的“版图”。这期间，日本所称“华北”，主

① [日]外务省：《关于对华政策》（1937年7月15日）。此件为“时局宣传资料”，有“极秘”标志，只供有关官员履行职务时参考。《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北京图书馆（现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R.WT51（胶卷号，下同），IMT380（文件号，下同），第288～295页。